

安吉县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选粹

故鄣遗珍^①

安吉县文物局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序

在神秘的北纬 30°，富饶的太湖西苕溪流域孕育了安吉光辉璀璨的文化遗产。境内“浙江省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第一点”——上马坎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将浙江境内人类的活动历史提前到距今 80 多万年前；列入我国最高等级的遗址序列并与周口店、秦始皇陵、大运河等处于同等保护地位的安吉龙山古城遗址，是早期越国的重镇和秦鄞郡郡治，系三国两晋之前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安吉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名家荟萃。东吴名将朱治朱然一族、南朝著名文学家吴均、明代著名的“吴氏父子四进士”、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以及诸闻韵和诸乐三等，为安吉深厚的历史文化添光溢彩。

文物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和记忆，是国家和民族的“金色名片”，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加强文物资源的调查、展示和利用，将有利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安吉作为全国文物大县，深感责任重大。自国务院启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积极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全面推进普查各项任务。历时三年，全面完成 6 家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共计 13255 件 / 套文物藏品的普查数据登录工作。

通过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安吉县基本摸清了本县范围内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保存状况、保管权属和使用管理等情况，为制定安吉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规划提供了详实而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安吉县普查办积极推动普查成果的转化和利用。《故鄞遗珍》的出版，将普查中发现的重点文物展现在大家眼前，其目的是为了不断增强民众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诞生地的深厚文化滋养。这些遗珍既是安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标志，也是我们安吉县人民宝贵的财富，

更是“中国美丽乡村”“中国最美县域”文化魅力之所在。因此我们在践行“两山”的重要思想的伟大进程中，文物部门要尽己之责，专业人员要尽己之能，大众要尽己之力，共同将我县的文物保护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彭忠心

2017年8月

目 录

绪论	001	战国 彩绘泥质灰陶	034
		战国 彩绘泥质灰陶鼎	035
		战国 彩绘泥质灰陶豆	036
		战国 彩绘泥质灰陶盒	037
		战国 硬陶羊角器	038
		西汉 绳纹折腹陶罐	039
		东汉 弦纹筒形双系陶罐	040
		东汉 篛纹陶罐	041
		东汉 山尖纹陶水井连吊桶	042
		五代 独角陶脊兽	043
		宋 花卉纹陶盖罐	044
		宋 陶镇墓兽	045
		明 紫砂小口罐	046
		西周 水波纹原始瓷罐	047
		春秋 原始瓷盅式盖碗	048
		战国 S 纹原始瓷镇	049
		战国 水波纹原始瓷镇	049
		战国 网纹提梁原始瓷盂	050
		战国 谷纹圈足原始瓷烤炉	051
		战国 水波纹铺首三足原始瓷簋	052
		战国 弦纹原始瓷盖钵	053
		战国 镂空纹双系长颈原始瓷瓶	054
		西汉 水波纹铺首衔环原始瓷敞口壶	055
陶瓷器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夹砂陶鼎	014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圈足带把陶碗	015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红陶盃	016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带把陶盃	017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陶杯	018		
新石器时代马桥文化 席纹硬陶鸭形壶	019		
西周 菱形纹四系硬陶罐	020		
春秋 组合纹硬陶坛	021		
春秋 方格纹双系硬陶罐	022		
春秋 硬陶勾鐎	023		
春秋 硬陶甬钟	024		
战国 麻布纹双釜硬陶罐	025		
战国 直条纹硬陶罐	026		
战国 麻布纹硬陶坛	027		
战国 麻布纹双系筒形硬陶罐	028		
战国 谷纹硬陶壁形器	029		
战国 绳纹红陶支座	030		
战国 水波纹硬陶钵	031		
战国 水波纹硬陶釜	032		
战国 麻布纹三系硬陶盘	033		

明 花蕾形银坠饰	115
明 嵌料点翠鎏金银花簪	116
明 嵌宝石金戒指	118
明 银臂钏	118
明 鎏金银凤簪	119
明 鎏金八仙庆寿银饰	120
明 书卷头银簪	120
清 百戏纹蝠头金簪	121
明 葫芦形银耳环	121
清 “顺和”人物楼阁蝠纹金钏	122
清 缠枝纹蝠头如意金簪	123
清 蝠头寿字缠枝纹金簪	123
清 “福寿”暗八仙纹金簪	124
清 “五福团寿”缠枝纹金耳挖簪	124
清 缠枝蝠纹金簪	125
清 “大源”缠枝纹如意金簪	125
清 如意莲蓬并头金簪	126
清 “长命富贵”叶形金耳坠	126
清 飞蝠盆花金挂饰	127
清 鎏金缠枝纹银耳挖簪	127
清 鎏金缠枝蝠寿纹银簪	128
清 鎏金福寿如意缠枝纹银簪	128
清 “德和”鎏金蝠首缠枝纹银簪	129
清 “德和”鎏金蝶恋花银簪	129
清 “德和”鎏金缠枝纹银耳挖簪	130
清 “德和”铭兰花纹钥匙形银饰	131
清 “德和”人物楼阁团花纹银钏	132
清 鎏金缠枝纹银如意簪	133
清 “德和”鎏金嵌宝喜上梅梢银簪	133
清 “泰成”“足纹”鎏金如意缠枝纹银簪	134
清 鎏金嵌宝点翠银花簪	135

清 鎏金嵌宝银凤簪	135
-----------	-----

玉石器

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 玉玦	138
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 玉玦	138
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 玛瑙玦	139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39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0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0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1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1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2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3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玦	143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4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4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5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5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出戟玉璜	146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6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6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7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璜	147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牙形玉饰	148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饰	148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方形玉管	149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管	149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玉环	150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玛瑙钺	151
新石器时代 牙形玉饰	152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玉冠形饰	152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玉锥形器	153	战国	玉管	174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玉璧	153	战国	琉璃管	174
商	嵌绿松石雕花石器柄	154	战国	料管	175
商	龙形玉璜	155	战国	料管	175
商	玉珠	156	战国	琉璃珠	176
战国	嵌绿松石兽面纹滑石剑格剑首	156	战国	琉璃珠	177
战国	谷纹龙形玉璜	157	战国	琉璃珠	177
战国	谷纹龙首玉带钩	157	战国	琉璃谷纹璧	178
战国	谷纹玉璧	158	汉	椭圆形水晶珠	179
战国	云纹龙首玉带钩	158	西汉	琉璃瑱	180
战国	小玉人饰	159	西汉	琉璃耳珰	181
战国	龙纹玉牌	160	西汉	琉璃耳珰	182
战国	卷云纹龙形玉佩	161	东汉	玉鼈	183
战国	玉鞞	162	宋	葫芦形玻璃瓶	184
战国	卷云纹龙形玉佩	163	宋	苹果形玻璃瓶	185
战国	心形玉佩饰	164	元	透雕荷雁青玉饰	186
战国	绞丝纹玉环	164	明	透雕二层琢白玉冠饰	187
战国	绞丝纹玉环	164	明	玉禁步	188
战国	琉璃环	165	明	猴形玉挂饰	189
战国	勾云纹玉璜	166	明	鸭形玉挂饰	190
战国	勾云纹玉觿	166	明	鹅形水晶挂饰	191
战国	扭丝纹玉觿	167	明	桃形水晶挂饰	192
战国	卷云纹玉觿	167	明	蘑菇头玉簪	193
战国	蝉形玉珔	168	明	蘑菇头玛瑙簪	193
战国	云雷纹圆形玉佩	168	明	牡丹蝠鹊龙纹玉牌	194
战国	勾云纹圭形玉佩	169	清	透雕白玉子母佩	195
战国	勾云纹圭形玉佩	169			
战国	谷纹滑石瑗	170			
战国	玉虺龙形佩	171	清	咸丰九年翁同龢“虎”隶书轴	198
战国	玉龙佩	172	清	明羲草书竹下轴	199
战国	卷云纹龙形玉佩	173	清	冀惟勘山羊图轴	200

清 成亲王永理楷书高添暗养七言联	201	图轴	226
清 光绪二十九年高邕之行书润松碧海五言联	202	1934 年 诸闻韵墨松图轴	227
清 乾隆十三年方士庶山水图轴	203	近代 郑孝胥行书偶然轴	228
清 光绪十年徐祥得利图轴	204	近代 潘趣琴设色山水图轴	229
清 光绪五年王礼五伦图轴	205	1935 年 朱嘉（朱文侯）设色花鸟册页	230
清 方野桥芭蕉竹子图轴	206	民国 袁克文行书风雨云波五言联	232
清 光绪十年任伯年芜青亭长图轴	207	现代 沈尹默行书余读东坡轴	233
清 光绪二十六年吴昌硕设色桃花图轴	208	近代 徐桢设色百寿图镜片	234
清 光绪二十八年吴昌硕兰壶图行书梅溪团扇合轴	209	1930 年 楼辛壶杜工部诗意山水图轴	235
清 光绪三十四年吴昌硕墨菜图轴	210	1942 年 汪亚尘设色鲈鱼图轴	236
近代 吴昌硕墨荷中堂图轴	211	近代 汪亚尘设色寿翁图轴	237
1923 年 吴昌硕自画像图轴	212	1924 年 沈兆涵设色人物图轴	238
1923 年 吴昌硕设色杜鹃花图轴	213	近代 洪庶安设色牡丹图轴	239
1918 年 吴昌硕篆书乐无饮且六言联	214	近代 洪庶安设色凌霄牵牛花图轴	240
1922 年 吴昌硕设色菊花石鼓文竹骨折扇	215	1986 年 沙孟海行书缶庐讲艺图碑记轴	241
1903 年 吴昌硕隶书茅堂石领七言联	216	1984 年 王个簪设色松石灵芝图轴	242
1893 年 蒲华竹石图轴	217	1974 年 诸乐三设色棉花图轴	243
近代 汪浩如秋色图轴	218	1973 年 诸乐三设色雁来红图轴	244
近代 溥儒水墨山水图轴	219	1965 年 诸乐三岩石杜鹃图轴	245
1918 年 王一亭设色无量寿佛图轴	220	现代 诸乐三小龙湫山水图轴	246
1918 年 王一亭设色欢天喜地图轴	221	1962 年 诸乐三设色南瓜图轴	247
现代 黄宾虹“惟三”篆书披	222	1936 年 诸乐三设色贵寿无极牡丹图轴	248
1936 年 吴茆之天奇诸乐三合作设色丛篁竹鸡图轴	223	1930 年 诸乐三红白梅花图轴	249
1936 年 吴茆之诸乐三合作设色斓斑秋色图轴	224	1944 年 沈蕴真行书乍看回洲轴	250
1936 年 吴茆之天奇诸乐三合作设色花鸟图轴	225	1931 年 日本长尾甲行书为善乐镜框	251
1936 年 诸乐三诸闻韵合作鸡冠花墨竹		1964 年 郭味蕓兰石图轴	252
		1964 年 陈半丁设色菊壶图轴	253
		1926 年 吴藏龛隶书录急就篇首章轴	254
		1922 年 吴藏龛设色松石牡丹图轴	255
		1958 年 吴瑶华设色春风入袖牡丹图轴	256
		1964 年 阮性山墨梅图轴	257

1964 年	钱瘦铁万古长青图镜片	258	清	设色佛像图轴	276
1964 年	陈半丁行书白鸟五言诗镜片	259	清	设色佛像图轴	277
1961 年	陆维钊红梅图轴	260	西汉	“军假司马”铜印	278
1982 年	沙孟海高名绝艺行书联	261	西汉	“李崇私印”铜印	279
1982 年	谭建丞行书承师一语感终身自作 七绝诗轴	262	西汉	“堂北之印”铜印	280
1986 年	曹简楼设色松梅菊紫藤四条屏 镜片	263	西汉	“堂千秋印”铜印	281
1962 年	吴东迈设色花果册页	264	西汉	“柴宽之印”铜印	282
现代	熊松泉设色双熊松树图横披	268	清	光绪二十二年吴昌硕“吴俊之印”石印	283
1985 年	唐云墨竹图轴	269	近代	吴昌硕“湖州安吉县”石印	284
1994 年	钱君匋设色牵牛花图轴	270	近代	朱疆村“西吴精”象牙印	285
1989 年	张品操设色古苔溪水运图镜片	271	近代	吴藏龛“执左券”方形石印	286
近代	吴昌硕行书与王个簪诗稿信札	272	1976 年	诸乐三“农业学大寨”方印	287
1917 年	吴昌硕行书与吴东迈信札	273	1963 年	诸乐三“平安”方印	288
1917 年	吴昌硕行书芜园面溪诗稿信札	274	1963 年	诸乐三“百花齐放”方印	289
清	设色佛像图轴	275	现代	王个簪“蕴真”长方形青田石印	290
			1934 年	汪英宾“吴瑶华”印兽钮昌化 石印	291

绪 论

◎ 周意群

安吉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太湖之南、天目山之北，三面环山，犹如盆地。境内西南面有天目山主峰龙王山，与安徽的宁国、广德两县接壤，西苕溪从南向北横穿县境，最后注入太湖，并与长江、东海相连。自古以来，安吉地势易守难攻，是古代人类理想的聚居地和军事避风港。

安吉历史悠久，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特别是商周时期的越国遗存分布尤为密集。早在距今约 80 万年左右的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安吉就有了人类活动；经晚更新世到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直至商周时期久延不衰；秦时设鄣郡于境内，安吉遂成为长江以南、太湖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改鄣郡为丹阳郡，以原鄣郡郡治置县，至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置安吉县，此间前后近 300 年是安吉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繁荣昌盛的时期。因此，在安吉境内，有着从旧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的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出土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分析，对照周边南北地区古文化遗存的承袭关系来看，这里是太湖流域古人类的发源地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来北往的古文化通道，乃至早期越国某一时期的中心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上交通将安吉与中原大地和长江以南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古通道。

目前，在安吉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3 处^①，其中上马坎遗址已经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在中更新世地层和晚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石核、石球、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品，其工艺较原始，加工粗糙。考古资料证明，早在 80 万年前，西苕溪两岸就有古人类

① 张森水、高星、徐新民：《浙江旧石器调查报告》，《人类学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03 年 5 月第 22 卷第 2 期。



的活动遗迹。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安吉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在西苕溪流域，主要为三大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安乐遗址与芝里遗址位于西苕溪岸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安吉县博物馆对这两处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根据出土器物分析，两处遗址上层为良渚文化，中层为崧泽文化，下层为马家浜文化，其中以崧泽文化为主体，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遗物数百件。研究表明，两处遗址不仅距离较近，文化内涵亦相近，其所处地理位置恰好是崧泽文化分布区域的西缘，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

遗存内的马家浜文化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为褐灰色土，含少量陶片。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为泥质红陶盆、豆、泥质黑陶杯、夹砂红陶鼎等，极少有玉器出土。

遗存内出土的崧泽文化陶器有鼎、釜、豆、壶、杯、钵等，其年代大致可分为两大段。第一段，鼎、釜的陶质夹砂较粗，鼎以圆腹、底圆居多；第二段，夹砂略细，鼎腹最大径靠下，底略平。陶器的形制、纹饰、组合等具有地方特色，同时也融入了来自北方同时期的文化因素。

遗存出土的玉器具有崧泽文化玉器的特征，特别是占据该遗址所出土玉器近一半的玉璜，形制、加工工艺和技术完全反映了崧泽文化玉器的主要特点。与陶器一样，安乐遗址玉器也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凌家滩87M8出土的双虎首玉璜，两端各浮雕一个虎首，用阴线、钻孔的技法浮雕出眼、鼻、耳以及奔跑状的前爪。而安乐遗址出土的玉璜下边缘也有一对近似动物爪的锯齿状凸起，可以看成是文化交流产生的一种现象。

此外，安乐遗址发现大量石铤、石凿等石器的半成品以及石器坯料，这些半成品和石器坯料的表面遗留较多打制的疤痕，有些半成品和坯料残断。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安乐遗址可能存在一个加工石器的场所。^② 芝里遗址则出土了少量的玉锥形器、玉冠形饰等良渚文化典型器物。^③ 由此可见，安乐遗址与芝里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分布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安乐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未公开发表。

二

商周时期吴越文化遗存在安吉分布特别密集,主要分布在龙山、笔架山之间的古城地区。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吴败越,安吉属吴;至勾践二十四年(前473)越灭吴后,安吉属越。越王无疆二十三年(前333)楚败越,安吉遂成为楚国的辖地^④,楚文化逐渐渗入太湖地区。据安吉县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县境内发现商周时期古墓群136处,遗址46处,2014年又发现窑址3处。

古城遗址位于安吉中部偏北的丘陵平原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遗址平面略呈方形,城壕围护,东有苕溪,西有沙河,背靠九龙山,面向笔架山。考古发掘表明遗址区文化堆积丰厚,上至春秋战国,下达秦汉六朝。无独有偶,古城遗址东北800米有一处窑山遗址(2017年新增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至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文物局对其进行联合考古试掘,发现其始筑年代可能早至春秋时期。两处遗址之间的关联有待专家学者们进一步考证研究。

流行于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是颇具越地特色的墓葬形式,在安吉境内多有遗存。受中原和楚文化影响,春秋晚期出现的土坑木槨墓亦成为境内越文化墓葬的重要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古城地区周围采集、出土了一批商周青铜器和印纹硬陶、原始瓷等吴越文化典型器物。

1976年,古城遗址东南面的三官周家湾出土了一组兽面纹的青铜鼎、觚、爵、案足等礼器,伴出的还有龙形玉璜、玉环、玉珠及嵌绿松石的石雕器柄。^⑤关于这组器物的年代,李学勤老师认为属于商代^⑥;郑小炉从之^⑦;高至喜定为商代晚期中段^⑧;马今洪认为觚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其他器物的时代为春秋时期^⑨;俞珊瑛定为春秋早期^⑩。综上所述,无论年代如何定论,这组器物均可以视作浙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发展的缩影,为我们研究商周浙江地区的青铜文明以及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提供了有效资料。

20世纪末开始,在龙山墓群、笔架山墓群以及上马山墓群范围内,考古发掘了一批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大墓,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与原始

④ 方杰:《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⑤ 浙江安吉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年02期。

⑥ 李学勤:《论安吉、长兴的商代青铜器》,《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⑦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第18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⑧ 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商周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第1—14页,岳麓书社,1999年。

⑨ 马今洪:《试论浙江安吉三官乡土墩墓出土青铜器》,《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中国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年。

⑩ 俞珊瑛:《浙江出土青铜器研究》,《东方博物》第三十六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瓷。^⑪2002年4月,在龙山墓群东1公里处发现一座战国墓^⑫,出土玉器有璜、觿、圭、琚、璧、佩、饰、管、珠等52件,陶器有镇、纺轮、鉴、釜等7件,原始瓷器有甗、钵、筒形罐等27件,以及石瑗17件。2004年11月,在此墓葬1公里外,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墓^⑬,在主墓室被盗的情况下,仍出土了龙形玉佩、玉环、玉扳指、小玉饰和绿松石环等10件玉石器,璧、瑗、纺轮和角形器等陶瓷器共85件,漆木甲2件,墓外器物坑出土硬陶、原始瓷、泥质陶等170件。墓内出土的玉璧、龙形玉佩等一批玉器以及原始瓷鉴、陶镇等仿青铜礼器,均可证明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显贵,应是越国贵族。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瓷产生于夏商之际,但这一时期的出土数量极少且器型单一,安吉上马山墓群却出土了西周早期的原始瓷^⑭。安吉县博物馆馆藏的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型较为单一,有盂、罐、碗等,造型简单古朴,除饰弦纹外,还堆贴小泥饼作装饰。至春秋时期,出土数量逐渐增多,器型与纹饰也逐渐丰富起来,有碗、盘、盂、碟、钵、罐等,堆贴处由小泥饼改为S形,纹饰则有弦纹、水波纹、网纹、云雷纹等。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类型也空前丰富,胎釉质量进一步提升,除了日常所用的碗、杯、盂等,还出现了大量仿青铜的礼器与乐器,说明越国在此时已经开始接受中原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同时赋予了原始瓷更为丰富的文化含义。^⑮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台湾等省,普遍发现了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征的文化……这是古越人的文化……对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⑯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作为越文化分布区,安吉境内也留下了大量的印纹硬陶。马桥文化的鸭形壶、鸭形尊、罐等质地较为坚硬,圜底内凹,器表拍印席纹、回纹与直纹等几何纹饰,纹饰简单而不规则。西周时期则器型有甗、罐等,胎质较厚,多为平底,只有少数器物为圜底,纹饰增多,有曲折纹、回纹、云雷纹、席纹、叶脉纹等,且开始出现组合纹饰,如弦纹与回纹相组合、叶脉纹与回纹相组合等,纹饰一般粗深有力,具有鲜明的浮雕感,从而呈现出粗犷、质朴之美,同时器物上附有堆饰。春秋时期胎质较薄,而器型则更为规整,常见的有坛、罐、甗、盂等,纹饰有方格纹、回纹、云雷纹、米筛纹、席纹、

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

⑫ 周意群:《安吉垅坝战国墓发掘报告》,《东方博物》2013年03期。

⑬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越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⑭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未公开发表。

⑮ 陈元甫:《陈元甫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78页。

⑯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

叶脉纹、菱形填线纹等，大部分以组合纹饰出现，如回纹与曲折纹、席纹与叶脉纹等，纹饰拍印则显得细而浅，浮雕感大为减弱。战国时期的器型有坛、罐、盂、盘等，其中罐的变化较为丰富，有有系或无系，有单鬲或双鬲等；纹饰上则趋向简单，大量器表上只拍印麻布纹或小方格纹，组合纹基本不见，器物造型更为规整且精致漂亮。^{①7}

越王无疆二十三年楚败越，安吉成为楚国辖地^{①8}，楚文化渐渐渗入太湖地区。在葬制方面受楚文化掣分厢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①9}。据史书记载，楚灭越后，为加强对越地的统治，于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将太湖周围的苏南、浙北、上海、皖西南之江东区的吴地封为春申君的封地，鄞城（今安吉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楚国重镇之一。截至目前，安吉已发现楚式墓葬20余座^{②0}，多为竖穴土（岩）坑墓，有的带斜坡墓道，大部分有木椁，木椁周围填有青膏泥或白膏泥，随葬品以具有典型楚文化特色的泥质陶鼎、豆、盒、壶、钆等为主，少数墓葬出土有楚式铜器或兵器及俑、漆木器等。这些墓葬与吴越地区流行的土墩墓有着明显的区别。此时的安吉，吴越文化逐渐为楚文化所代替，并影响了秦代与西汉时期。

1998年，安吉县荻坝村发现一座战国晚期小型楚墓，编号为D1M2，出土泥质灰黑陶鼎2件、盒1件、褐陶壶2件、玉璧1件。^{②1}2003年安吉良朋镇砖瓦厂发现一座战国晚期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漆木奁、漆木耳杯、泥质彩绘陶豆、壶、鼎、钆和高约55厘米的木俑6件。^{②2}2006年安吉五福发掘的较大规模的五福M1，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了大批楚文化遗物，包括彩绘泥质灰陶鼎6件、盒4件、豆6件、钆6件、杯4件；钐印冥币1套99件；陶俑5件；铜剑、铜戈、铜盃、铜镜各1件；漆木器21件/套，有奁1件、盒2件、樽1件、耳杯9件、盘1件、案1件、凭几1件、瑟1件、六博1套、篋子1件、虎子1件、坐便架1件、髹漆竹竿铜镞箭5件、木俑9件等。^{②3}这些楚墓中出土了一大批泥质彩绘陶俑、鼎、盒、钆等。此外，安吉地区还不断发现楚币。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楚国金币郢爱^{②4}；1991年，安吉县安城镇古城村又发现楚国金币郢爱1件；1998年，安吉良朋镇上柏汉墓D10M21则出土楚国金币郢爱1件^{②5}。

同时，安吉也是浙江省内出土战国铜镜最多的地区。1998年3

①7 周意群：《安吉博物馆馆藏的印纹硬陶》，《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研究》，故宫出版社，2016年。

①8 方杰：《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①9 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期。

②0 发掘资料，未公开发表。

②1 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荻坝村发现一座战国楚墓》，《考古》2001年第7期。

②2 周建巨、周亚乐：《安吉发现我省首座楚国棺椁墓》，《浙江日报》2003年5月11日。

②3 匡得整：《浙江安吉发现“郢爱”》，《考古》1982年第3期。

②4 程亦胜：《浙江安吉古城发现楚金币》，《考古》1995年第10期。



月安城窑岗 D1-M4 发掘出土一面战国四山纹镜,这是浙江境内首次出土的四山纹镜。至 2010 年,在安吉境内的五福、上马山等地区又出土了 6 面战国镜,现皆陈列于安吉县博物馆专题陈列展览“清质昭明——安吉出土铜镜陈列展”^{②6}中。这些铜镜的纹饰、形制均属于楚式镜。究其来源,可能是铸于楚地并通过战争掠夺或商业往来流入吴越地区,也可能是当地仿照楚镜而铸造的。

三

由于安吉独特的地理位置,秦始皇设鄣郡于境内,安吉遂成为长江以南、太湖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改鄣郡为丹阳郡,以原鄣郡治置县,至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置安吉县,前后近 300 年是安吉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繁荣昌盛的时期。境内历史文化遗存中,汉墓数量多且墓葬规格在浙江地区为最高,出土的遗物也最为丰富。

上马山墓群位于安吉县良朋镇(现天子湖镇),1989 年和 1990 年,考古人员两次对良朋砖瓦厂被破坏的 2 个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②7},共发现 8 座墓葬,年代为西汉早、中、晚时期,共出土陶器 153 件,器型有鼎、盒、壶、钆、瓶、罐、瓮、双耳罐、坛、洗、灶、釜、甄、盆、水井、猪、狗、鸡、熏等;铜器 15 件,有鼎、釜、洗、豆、勺、镢、环、泡钉、鼓、镜等,以及钱币 400 余枚;铁器 7 件,有鼎、釜、三足架、剑、环首刀以及棺钉等。其中出土的小铜鼓,从形制与纹饰看,属李伟卿先生所做分类中的 I 型 b 式鼓,使用的下限在汉文帝与汉武帝之际^{②8},为太湖流域地区首次出土。

因天子湖工业园良朋园区的建设,2007 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安吉县博物馆对园区建设用地区块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 2012 年,共发掘 128 座土墩,清理墓葬 530 多座,其中 422 座为汉代竖穴土坑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第 49 号墩(D49)随葬品共 153 件/组,器类有陶器、玉器、铜器、铁器、石器和料器等,年代在西汉中期至晚期^{②9};第八号墩为一座方形墓坑的墓葬,编号 D8M1,墓葬共出土 41 件随葬品,种类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

②6 安吉县博物馆编:《天目苕水安吉兮——清质昭明》,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 年,第 12—21 页。

②7 程亦胜:《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 年第 7 期。

②8 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考古》1979 年第 1 期。

②9 黄昊德,沃浩伟:《浙江安吉县上马山第 49 号墩发掘》,《考古》2014 年第 1 期。

玉器、漆器等，年代在新莽至东汉初。

2006年，在工业园区内发掘了两座东汉纪年墓，出土有陶瓷、金银、青铜等器，其中出土的金戒指为圆环式造型，光素无纹；银钗呈U形双股式，圆梗体，锤鍍成简单大方的造型。同时还出土有多种铭文砖，如“熹平五年丙辰在西惠作大吉”“富贵祥宜庚壬高远”“富贵不老寿万世之孙”“万岁不败富贵宜官”“大吉宜昌”和“官作口斋”等。

此外，上马山墓群中还有不少带墓道和外藏室的规模很大的墓葬，有的规模超过D49M6。这些大型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汉早中期，这与鄣郡的历史沿革相符合。上马山墓群的发掘，对于安吉古城遗址的综合研究，尤其是确定古城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研究太湖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东汉末期，由于故鄣辖境广阔，汉室为便于统治，于灵帝中平二年，割故鄣南境另置一县，取“安且吉兮”之“安吉”二字为县名，隶属丹阳郡，此安吉建县之始。三国东吴时期，东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安吉朱氏家族中的朱治、朱然、朱绩先后辅佐东吴，成为安吉最显赫的家族。1957年在安吉三官发掘的东吴大墓疑为朱治之墓，出土神兽镜一枚。宝鼎元年（266），安吉隶属吴兴郡。晋室东渡，衣冠南迁，中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安吉作为南京至杭州的要道，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制作更为兴盛，其造型承袭汉代，较多地吸收了陶器与漆木器的造型，丰富多样，除鸡首壶等常见的器型外，还有堆塑罐、猪圈、鸡笼、虎子等，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1993年，高禹天子岗三国、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堆塑罐、三足洗、鸡首壶等制作精良，青瓷胡人骑羊插座及青瓷蚰笼小巧玲珑，为同时期越窑青瓷的精品。

③④ 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
《文物》1995年第6期。

四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迅速，社会动荡不安。隋唐时期，安吉撤而复设，变更频繁：唐武德四年（621）置桃州（今安徽广德），安吉改属桃州；唐武德七年（624）废桃州，属长城（今浙江长兴）；唐麟德元年（664）复置安吉县，属湖州；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故鄣并入安吉县，安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安城附近。

隋唐以后，安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安吉几乎没有发现。五代十国的吴越国重视佛教和佛寺建筑，颇具规模的灵峰寺和灵芝塔在此时相继建成。1994年，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灵芝塔落架大修时，在天宫发现一批器物^{③①}，有鎏金银质阿育王塔1座、钱币19枚、棱形水晶柱1件、代舍利用的水晶珠3颗、玻璃瓶2件、鎏金银饰4件；天宫外另有钱币6862枚、铜镜2面，其他银饰若干。灵芝塔天宫发现的银饰上为唐宋流行的缠枝花图案，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银饰的制作工艺和纹饰分析，具有明显的宋代特征；钱币则从西汉半两、五铢至北宋景祐元宝、皇宋通宝，除少数几枚年代较早为西汉时期，绝大部分为唐宋时期，与金华市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钱币年代基本相同^{③②}。同时，灵芝塔在1989年时发现五代时期的独角陶脊兽4件，胎质呈青灰色，器体呈独角龙状，角端耸起，阔眉突眼，卷鼻裂牙，面划须纹，造型别致，形象生动。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安吉成为临安西北的屏障。南宋偏安江南，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湖州则成为当时全国的造镜中心之一，湖州镜更是堪称翘楚。2009年，芝山寺遗址发现一组元代的龙泉窑青瓷器^{③③}，其中一件管足鼎式炉，内外通体施青绿色釉，釉色莹润，釉面光洁明亮，泛着玻璃光泽，整件器物造型秀雅精致，为龙泉窑青瓷中的精品；鼓式盖盒，下腹贴设鼓钉9枚，两侧对称贴设五瓣形梅花衔环铺首，盖沿外壁贴设鼓钉9枚，整件器物形状犹如一鼓。

南宋宝庆元年（1225），改湖州为安吉州。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安吉州为湖州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安吉先由徐寿辉部占领，继为张士诚部所据，安城城墙始建于此。2002年，安吉兰田村农田整理时发现一处钱币窖藏，其钱币下限年代正与此相吻合。^{③④}

明嘉靖年间，安吉鄣吴村的吴麟、吴龙、吴维岳、吴维京父子兄弟四人同中进士，“吴氏四进士”使鄣吴村名噪江南，成为东南一大望族。1966年，吴麟墓被毁，出土一批器物^{③⑤}，以金、银、玉器为主，并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采用了锤鍍、花丝、镂雕、篆刻、镶嵌等传

③① 周意群：《安吉五代灵芝塔》，《东方博物》2014年04期。

③② 王士伦：《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第47页。

③③ 张秋华：《安吉芝山寺出土的元代龙泉青瓷器》，《东方博物》2013年02期。

③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31—333页。

③⑤ 周亚乐：《安吉出土元代钱币窖藏》，《甘肃金融》2003年第5期。

③⑥ 周意群：《安吉明代吴麟夫妇墓》，《东方博物》2014年02期。